

林纾，一个复杂的存在。所谓前半生是人——翻译大家，堪称五四新文学的不祧之祖；后半生是「鬼」——晚年林纾，五四话语中最顽固的「封建复古派」。真实的林纾是什么样子的？

张俊才 王勇 著
晚年林纾的困惑与坚守

顽固非尽守旧也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顽固非尽守旧也

晚年林纾的困惑与坚守

张俊才 王勇 著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
河北师范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顽固非尽守旧也：晚年林纾的困惑与坚守 / 张俊才
著. —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1
ISBN 978-7-203-07534-9

I. ① 顽… II. ① 张… III. ① 林纾(1852~1924) - 人物研究 IV. ①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58555 号

顽固非尽守旧也：晚年林纾的困惑与坚守

著 者：张俊才 王 勇

责任编辑：阎卫斌

装帧设计：陈 婷

出 版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030012

发行营销：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 (传真) 4956038 (邮购)

E-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www.sxskcb.com

经 销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山西力新印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7

字 数：270 千字

印 数：1-3500 册

版 次：2012 年 1 月 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03-07534-9

定 价：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目 录

引言 晚年林纾:一个复杂的存在 / 001

第一章 “五四”:林纾的“滑铁卢” / 007

- 第一节 中年林纾:五四新文学的不祧之祖 / 007
- 第二节 晚年林纾:五四新文化派的首选对手 / 021
- 第三节 身后林纾:五四话语中的“封建复古派” / 044

第二章 晚年林纾的政治绝望 / 061

- 第一节 辛亥之年对“共和”的认同与期望 / 061
- 第二节 对议会制下“党争”的不满与失望 / 070
- 第三节 对“政府”的维护与对“政客”的谴责 / 082
- 第四节 频频“谒陵”为哪般? / 094
- 第五节 双重的政治身份与矛盾 / 104

第三章 晚年林纾的文化忧思 / 117

- 第一节 林纾的西学观 / 117
- 第二节 林纾的中学观 / 127
- 第三节 中体西用:林纾基本的文化立场 / 139
- 第四节 从女权意识看林纾文化观之新旧杂陈 / 149
- 第五节 林纾言情小说的爱情伦理及其文化分析 / 159

第四章 晚年林纾的文学焦虑 / 167

- 第一节 典范转移超出了林纾的维新构想 / 167

- 第二节 “力延古文之一线”的初衷与劳绩 / 181
- 第三节 《春觉斋论文》:传统古文理论之收束 / 193
- 第四节 林纾古文:凄美而薄暮的夕阳艺术 / 204

第五章 重评五四新旧思潮之争 / 217

- 第一节 拂去强加于林纾的不实之词 / 217
- 第二节 应该正视五四新文化派的缺点 / 226
- 第三节 重新认识五四新旧思潮之争的性质 / 239

结语 晚年林纾: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 / 252

参考文献 / 261

后 记 / 267

晚年林纾：一个复杂的存在

晚年林纾，一个复杂的存在。

晚年林纾，因为与辛亥革命以后进入北京大学的章炳麟势力不合，^①遂辞去这座全国第一高等学府的教职，在京城专以卖文鬻画为生。辛亥之年，林纾虚龄整60岁，无论如何，这该是进入“晚年”的一个时间点了。晚年的林纾依然风骨不改，他曾在自己的鬻画润目上题写了这样一首诗：“往日西湖补柳翁，不因人热不

① 林纾辞北京大学教职事，时在民国2年(1913)。朱羲青编《林畏庐先生年谱》(世界书局1949年出版，下引此书均此版)本年谱文云：“是岁，仍与姚永概共事大学堂，既皆弗合而去。”至于“弗合”详情，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有如下说法：“初纾论文持唐宋，故亦未尝薄魏晋。及入大学，桐城马其昶、姚永概继之。其昶尤吴汝纶高等弟子，号为能绍述桐城家言者，咸与纾欢好，而纾亦以得桐城学者之盼睐为幸，遂为桐城张目，而持韩柳欧苏之说益力。既而民国兴，章炳麟实为革命先觉，又能识别古书真伪，不如桐城派学者之以空文号天下。于是，章氏之学兴，而林纾之说增。纾、其昶、永概咸去大学，而章氏之徒代之。”(见该书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94页)林纾在寄其第三子林璐的信中谈到辞北京大学教职事时，亦强调主因是当时的北大校长何燏时“思用其乡人”。何燏时(1878—1961)，字燮侯，浙江诸暨人，与章炳麟同为浙人。斯时章炳麟虽未到北大任教，但他的弟子如马裕藻、沈兼士、朱希祖、黄侃、刘师培、钱玄同、鲁迅和周作人等却陆续涌进北大，形成了北大文科的“浙系”。现将林纾寄林璐信的有关内容录以备考：1913年初寄林璐的信中说：“大学堂校长何燏时，大不满意于余，对姚叔节(按：即姚永概)老伯议余长短。余闻之失笑，以何某到校时，余无谄媚之容，亦无趋承之态，故憾我次骨，实则思用其乡人，亦非与我仇也。”1913年阴历二月十日寄林璐的信中又说：“大学堂薪水，截至阴历三月止，四月便停课不上堂，须至八月招生。至于请我与不请我，尚在未定。校长何某，目不识丁，坏至十二分，专引私人。钟点既多，余老不能堪，幸《平报》尚可支至今年。”1913年阴历五月二日寄林璐的信中又说：“刻下大学堂学生，大闹风潮，驱逐校长。何燏时系小人之尤，不知怪我何事，及对缪荪生说我品行不端，学问卑下，其实怪我不会打他马屁，做此谣言。尔父义命自安，凡事任天，即不为大学堂教习，亦有啖饭之地。不图彼糟蹋我不成，转为学生驱逐，皇天有眼，一一不爽。”转见李家骥等整理：《林纾诗文选》第372、377、379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出版(下引此书均此版)。但此书对有关书信的年月说明有误。

书空。老来卖画长安市，笑骂由他我自聾。”^①显然，晚年林纾清楚地知道他这位文坛老翁曾是舆论的焦点，曾是一批人笑骂的对象。但是，晚年林纾对这一切似乎并不在意，他固执地按照自己的信仰和为人标准去行事，固执地我行我素地走到他生命的尽头。1924年10月9日（甲子年九月十一日）丑时，林纾在他的北京寓庐里溘然长逝。在这个纷扰的尘世上，他度过了73个春秋。林纾逝世后，虽然陈焕章（康有为弟子，光绪进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孔教会总干事）、陈衍（林纾同科举人，曾任学部主事，同光体著名诗人）、卓孝复（林纾同科举人，光绪进士）、徐世昌（光绪进士、翰林，官至东三省总督、体仁阁大学士，1918年出任民国大总统）、陈宝琛（同治进士，宣统帝傅）、黄侃（章太炎弟子，著名音韵、文字、训诂学家）、赵尔巽（同治进士，翰林院编修，民国清史馆总裁）、力钧（光绪举人，兼通中西医，著名医学家）、郑孝胥（林纾同科举人，曾任广东、安徽按察使、驻日本神户领事，同光体著名诗人）、郭曾炘（光绪进士，曾任礼部右侍郎兼户部左、右侍郎）、魏易（著名文学翻译家，与林纾合译英美小说多部）、傅增湘（光绪进士，曾创办北洋女师范学堂，五四时期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等前清进士、民国官僚、文苑名流、生平至交都分别撰写了祭文、挽诗或挽联，但新文化阵营方面却暂时保持着沉默，似乎中国文坛上就不曾有过这样一位著名的翻译家、古文家、小说家和诗人。就这样，林纾终于从遭人“笑骂”的热闹场中淡出了文坛，淡出了人世，不再有“累月尽无事，吾心未觉闲”^②的焦虑，不再有“热肠一片应消歇，世变千重只坐观”^③的愤激，不再有“遂心唯有看山好，涉世深知寡过难”^④的感叹，不再有“吾力非孟韩，安足敌众口”^⑤的无奈。倘真的泉下有知，不知林纾老人会不会以“死”为他人生的解脱？

晚年林纾之所以遭人笑骂，众所周知的一个原因，是他在五四年间曾不计毁誉地挺身而出，为被新文化派宣判为“死文字”的文言文和据说其本质是“吃人”的孔孟儒学招魂。其实，早在辛亥之前，林纾就知道在当时已渐成风气的“西化”思潮面前，凡是为传统张目的都难免会被诋为“守旧”或“顽固”，但林纾在五四年间却不仅依然要挺身而出为传统招魂，而且至死都不认为自己的主张有什么大错，当然至死也不可能认同新文化派对文言文和孔孟儒学的批判。1924年的旧历

①见朱羲青编《林畏庐先生年谱》卷一第49页。林纾曾客居杭州，掌教东城讲舍，后应聘入京。居杭期间，林纾曾在西湖植柳，并自号“西湖补柳翁”或“六桥补柳翁”。

②林纾：《不眠》，《畏庐诗存》卷上第7页，商务印书馆1923年出版（下引此书均此版）。

③林纾：《怀江伯训》，《畏庐诗存》卷下第29页。

④林纾自撰春联，见朱羲青编《林畏庐先生年谱》卷二第61页。

⑤林纾：《岁暮闲居颇有所悟拉杂书之不成诗也·其七》，《畏庐诗存》卷下第6页。

五月间,也就是林纾逝世前仅四个月的光景,他曾赴陈焕章创办的孔教大学讲授《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并作了一首《留别听讲诸子》诗。这是林纾一生的最后一首诗篇,全诗如下:

任他语体讼纷纭,我意何曾泥典坟。鸳朽固难肩此席,殷勤阴愧负诸君。
学非孔孟均邪说,话近韩欧始国文。荡子人含禽兽性,吾曹岂可与同群!①

林纾自然可以至死都不认为自己的主张有什么大错,但铁一样严峻的现实却是:狂飙突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节节推进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未来。不仅1920年1月当时的民国政府教育部就颁令全国学校低年级的国文教育统一运用语体文,五四白话文运动以此骄傲地宣告着自己的胜利,而且五四以后现代中国的文化演进中,“批孔批儒”又曾经长期位居文化思潮的主流。正因为这样,晚年林纾不仅生前遭受着一部分人的笑骂,死后这种骂声依然喧嚷在按照五四话语撰写的各种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之中。

晚年林纾之所以遭人笑骂,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从1913起到1922年止,曾以六七十岁的老迈之躯,前前后后亲赴易州梁格庄拜谒光绪陵墓(崇陵)达11次之多。林纾一生并未入仕,但“谒陵”却成了晚年林纾年年必修的一门功课,直到1923年他实在走不动了才为止。辛亥之前的林纾笃信君主立宪的政治改革方案。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最终还是决定认同清帝“让政”这种“革命”结果,并表示要做一位“共和之老民”。应该说,从这时开始,林纾从理智上已清清楚楚地知道,大清王朝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复辟了(这不排除他在情感上有时仍会向往想象中的君主立宪政体)。惟其如此,他既未拥戴袁世凯的帝制自为,也未支持张勋拥立宣统复辟。晚年林纾同样清清楚楚地知道,不论他所身处的这个“民国”是怎样一个乱世,但谒陵都仍然是一种不合民国时宜的“遗老”之举,惟其如此,他的谒陵从不语及他人以免强人所难。②但晚年林纾却依然要不计毁誉地把谒陵进行到底。1921年冬十月,林纾已年过七旬,他第十次拜谒崇陵后曾写下这样一首诗,表示自己谒陵只是一种自安己心的私人行为:

衣冠九顿玉阶前,敢惜微臣衰老年。紫极重开当有日,白头十度此瞻天。

①见朱羲胄编《林畏庐先生年谱》卷二第62页。

②林纾《答郑孝胥书》对此有说明,见朱羲胄编《林畏庐先生年谱》卷二第59页。

③林纾:《谒陵礼毕纪哀一首》,《畏庐诗存》卷下第26页。

行踪只合寻吾契，心迹何须剖世贤。美煞淮王鸡犬福，却从铜辇早登仙。^③

林纾自然可以把谒陵仅仅视为一种自安己心的私人行为，但林纾毕竟是一位公众人物。在清末民初的文坛上，林纾不仅是文学翻译界无人可以匹敌的“译才”，而且由于擅长古文还被人们视为传统文学的“殿军”，林纾的小说、诗歌、绘画在当时也颇有影响。正因为这样，社会舆论就难以无视林纾的谒陵之举，自然更不可能理解和认同林纾的谒陵之举。于是，林纾的“遗老”帽子便从生前戴到身后，一直无法摘下来。

如果林纾原本就是一位封建老朽，晚年林纾的这一切行为就非常容易解释了。然而，情况恰恰相反。辛亥以前的林纾，虽不激进，但绝对是一位新派。无论是抨击列强，无论是鼓吹维新，无论是批判守旧，无论是译介西籍，林纾都能随着潮流前进。换言之，以辛亥革命为界，林纾的人生反差实在是太大了，大到一般人确实难以理解。于是，面对晚年林纾的作为，人们自然会提出一连串的“为什么”：一个曾经大量译介西方文学并以此播下新文学种子的人为什么在五四时代要挺身而出与新文学阵营对垒？一个明知卫护传统文学将被斥为“守旧”的人为什么要以殉道的精神“力延古文之一线”？一个明知卫护孔孟儒学将会被斥为“陈腐”的人为什么决心要“拼却残年极力卫道”？一个推崇“立宪政体”的人为什么在革命到来后却决计认同“共和”？一个认同了“共和”的人为什么在民国治下又宣称要以“大清举人”终其身？一个在大清王朝从未入仕的布衣之士为什么在清朝灭亡后要屡屡拜谒先皇光绪的陵墓？

为什么？如果按照曾有一种理论来解释，那当然很简单：根源就在于中国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如果我们关注一下近代以来中国文化演变的整体状况，当会发现一个颇堪玩味的现象，那就是1894年甲午战争后崛起的维新派人物（亦即所谓“老新党”）在辛亥革命之后都整体性地“落伍”了，其中某些当年看起来要较林纾更为先进的人物，后来的落伍竟然比林纾更甚。例如，康有为和严复两位，都曾经被毛泽东誉为近代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但康有为入民国后不仅一直应邀担任孔教会的会长，而且参与了张勋拥立宣统复辟的闹剧；严复入民国后不仅参与发起了北京的孔教公会，而且还列名发起了鼓吹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即便是比康有为、严复、林纾这些维新派人物在政治上更为激进的革命派人物，如章炳麟、刘师培、黄节、黄侃等，更是早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就已发起成立了著名的国学保存会，出版《国粹学报》等刊物，并且在入民国后也无一例外地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迄今为止尚无人就近代新派人物在现代的这种整体性的落伍现象进行过有深度的研究，即使有人偶然论及这一现象，也大多只是征引一下毛泽东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有关论述

了事。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论及近代维新派、革命派宣传的“新学”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在当时，这种所谓的新学的思想，有同封建思想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可是，因为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入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①我们当然不反对在学术研究中引用领袖的观点作论据，但前提是领袖的观点必须有助于说明相关的问题。就对林纾这类在现代社会里普遍“落伍”了的近代新派人物的研究而言，如果我们无法论证这些人在“民国”这个现代中国里，都不再反对列强的侵略而成了他们的奴仆，都不再同意引进西学而是单一性地主张“尊孔”或“弘扬国粹”，那么，仅仅引用毛泽东的上述论述是有助于解读这一复杂的文化现象的。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到了199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席卷全球，随着西方某些文化霸权主义者刻意把全球化解读为西方化，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和民族自信心的增强，随着当代中国许多人文学者对思想、文化、文学、艺术、哲学、历史诸领域中“身份”问题的关注以及缘此而生的“焦虑”感的出现，“振奋民族精神”，“弘扬民族文化”，便成为一种能使整个华夏民族为之动容的时代呼声。在此背景下，林纾当年与五四新文化派对垒这桩历史旧案又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人们开始重新检视这段历史，终于发现晚年林纾虽然也有这样或那样的过错，但他抨击五四新文化派的“守旧”的言论中，某些观点却显示出一种积极的意义和价值。相应的，人们也终于开始对五四新文化派及其在现代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影响进行真诚的反思。于是，一系列问题都不断地萦绕在人们的脑际，挥也挥不开：五四新文化派与林纾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性质的矛盾？“五四”确实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但与“五四”对垒的林纾就一定代表着反动的方向？“五四”的功绩足可以彪炳史册，但“五四”本身就没有缺点可言么？“五四”留给我们的遗产除了对科学和民主的热烈追求外，难道就没有另外一种属于负面的东西？“五四”遗产中这种属于负面的东西对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学术的发展是否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五四”迄今已将近百年，为什么我们的主流学术至今仍然不肯和不能对“五四”的遗产进行认真的反思？

——显而易见，晚年林纾绝不是一个毫无价值、毫无意义或者仅有负面价值、负面意义的“封建复古派”，绝不是一个思想陈腐、不值一晒的“封建遗老”！晚

^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0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出版。

頑

固

非
尽
守
旧
也

年林纾是一个复杂的存在,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如是,研究晚年林纾,就不仅仅是为了公正地评价林纾,更重要的,是可以以林纾为个案,对现代中国的文化发展作出富有深度的思考。

“五四”：林纾的“滑铁卢”

第一节 中年林纾：五四新文学的不祧之祖

在许多人眼中，林纾都是五四新文学的第一个罪人。然而，循着历史的线索上溯，在辛亥之前，林纾轰轰烈烈的文学翻译事业却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学的革新，并由此而播下了五四新文学的种子。正因为这样，一些尊重史实和学理的学者，早在1980年代就发表文章，称林纾的翻译是五四新文学的“不祧之祖”。^①

林纾正式走上文坛的时间是1897年。是年，林纾虚龄46岁，无疑已是人到中年了。这一年，林纾不仅在故乡福州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闽中新乐府》，而且也正式开始从事西方文学的翻译。

林纾是怎样走上翻译道路的？一般人都津津乐道于这样一个偶然性的事件：即1897年夏林纾的妻子刘琼姿因病去世，林纾不免情绪抑郁，精神苦闷。这时，在福州马尾船政局任职的魏翰、王寿昌（二人均曾留学法国）便鼓动林纾和他们一起翻译法国小说。据说王寿昌这样劝告林纾：“吾请与子译一书，子可破岑寂，吾亦得以介绍一名著于中国，不胜于蹙额对坐耶？”^②林纾一开始怕不能胜任，婉言谢却，但魏翰又强之再三，林纾才半开玩笑地说：“须请我游石鼓山乃可。”^③于

^①最早作出这一评价的，是蒋锡金先生。1983年，蒋在是年出版的《江城》（吉林）杂志第6期上发表了《关于林琴南》一文，其中提到1981年商务印书馆重版十种著名的林译小说时他写了这样一段话：“我很高兴，因为又可以重新温习一下这些少年时候读过的东西，检查一下这些作为中国新文学运动所从而发生的‘不祧之祖’，从内容的方面到形式的方面，从积极的意义到消极的意义，都是有很多问题值得加以探索的。”蒋锡金（1915—2003），祖籍江苏宜兴，生于南京。1932年开始翻译歌德和海涅的诗歌并进行创作。抗战期间任《抗战文艺》编委。1947年至东北大学（今东北师大）任教，有多种诗集、剧作、译著传世。蒋锡金的评价出自一位由五四新文学培养起来的现代作家之口，应该是有说服力的。

^②杨荫深：《中国文学家列传》第486页，1939年中华书局出版。

^③黄濬：《花随人圣庵忆》第238页，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

是,在游览福州著名的风景区石鼓山的船上,王寿昌手捧法文原著,口译小说内容,林纾则耳受手追,以凄美的文言整理成篇。后来林纾也曾回忆过这桩往事,他说:“回念身客马江,与王子仁(按:即王寿昌)译《茶花女遗事》时,则莲叶被水,画艇接窗,临楮叹喟,犹且弗怪。”^①但排遣丧妻的苦闷只能是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这部小说的具体诱因,而不是林纾决心以主要精力从事西洋文学翻译的根本原因。根本的原因,应是时代的维新思潮影响的结果,因为此时的林纾已经在思想、文化、政治倾向上成为一位维新派了,是年出版的《闽中新乐府》愤念国仇,指斥列强,抨击守旧,呼吁“通变”,批判迷信,鼓吹西学,正是林纾已置身于维新派行列的标志。关于此书,林纾的好友高梦旦曾有过这样一段回忆:

甲午之役,我师败于日本,国人纷纷言变法,言救国。时表兄魏季子(按:即魏翰)主马江船政局工程处,余馆其家,为课诸子。仲兄子益先生、王子仁先生,欧游东归,任职船局,过从甚密。伯兄啸桐先生、林畏庐先生亦时就游宴,往往互数日夜。或买舟作鼓山、方广游。每议论中外事,慨叹不能自己。畏庐先生以为转移风气,莫如蒙养,因就议论所得,发为诗歌,俄顷辄就。季子先生为出资印行,名曰《闽中新乐府》。^②

显然,当林纾和王寿昌合作,以奇特的方式开始翻译西方小说时,他已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传统士子,而是一个具有维新意识的新派文人了。众所周知,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维新派曾发起过一场具有革新意义的文学改良运动。他们在倡导“诗界革命”的同时又倡导“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等。而译介西洋文学又正是“小说界革命”的一大诉求。早在1897年夏曾佑和严复就在天津《国闻报》上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一文,主张译介欧美小说以“使民开化”。^③1898年末梁启超在日本创刊《清议报》时又发表了著名的《译印政治小说序》。梁启超认为:“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因此他主张应“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④可见,林纾在实践上从事小说翻译,与夏曾佑、严复、梁启超等人在理论上倡导小说翻译,是同时起步、同步进行的。显然,是“向西方学习”的维新

①林纾:《迦茵小传》题词《买陂塘·序》,见《迦茵小传》第2页,198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②高梦旦:《〈闽中新乐府〉书后》,转见朱羲青编《春觉斋著述记》卷二第5页,世界书局1949年出版(下引此书均此版)。

③严复、夏曾佑:《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中国近代文论选》(上)第18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下引此书均此版)。

④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中国近代文论选》(上)第155页。



要求,使他们在热心翻译事业这一点上不谋而合了。

依据一些零星的史料,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在1897年林纾正式从事西洋文学翻译之前,他已就与他人合作翻译小说之事进行过一些尝试。林纾生前曾写给胡孟玺(又名胡尔瑛,林纾弟子,福州人)一封信,其中抄寄了两首鲜为人知的“七十自寿诗”,其中一首诗有这样的诗句:“柴门临水白蘋开,月下听书老母来。”在这两句诗后面林纾又作了这样的注释:“先母太宜人人生时,颇喜纾所译小说,夜中恒听至三鼓始寝。”^①林纾的母亲是1895年底去世的,显然在1895年底以前林纾已从事过小说翻译,并向其母讲述过故事情节。另外,与林纾同时代的闽籍华侨文人邱炜菱还提到这样一些情况:

若林先生固于西文未尝从事,惟玩索译本,默印心中,暇复昵近省中船政学堂学生及西儒之谙华语者,与之质西书疑义。而 its 所得,以视泛涉西文辈高出万万。……又闻先生宿昔持论,谓欲开中国之民智,道在多译有关政治思想之小说始。故尝与通译友人魏君、王君,取法皇拿破仑第一、德相俾士麦克全传属稿。草创未定,而《茶花女遗事》反于无意中得先成书,非先生志也。^②

根据邱炜菱的这个记载,可见林纾在1897年以前不仅已有翻译西方政治小说以开通民智的想法,而且经常玩索他人译本,并到船政学堂向懂西文的华人和懂中文的西人请教译本中的疑难之处。正因为林纾事先有过一定的尝试、练习和准备,所以当他1897年跻身译界后,才能够一鸣惊人,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

从1897年林纾46岁正式走上文学翻译道路,到1911年(辛亥)林纾60岁时,15年间,林纾翻译并出版或发表的西方作品竟多达近70种,几乎每年都有4~5种翻译作品问世,形成了近代文学翻译史上的一大奇观。^③在这近70种的西

①林纾:《与胡孟玺书》,见福建省立图书馆藏手抄本《畏庐尺牘》。胡孟玺曾撰《林琴南轶事》一文,载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出版的《福建文史资料》,其中亦引用这两句自寿诗。可见,手抄本《畏庐尺牘》收《与胡孟玺书》确系林纾所作。林纾这首自寿诗,主旨是忆母,全诗如下:“柴门临水白蘋开,月下听书老母来。当日团圞无限好,至今怀想有余哀。病犹作健衣亲制,儿亦能厨笋自煨(太宜人喜笋菹,病中纾自制以晋,太宜人恒称可也。他饌亦纾自制)。一事直堪悲到骨,五更空褥越王台(太宜人病瘵而跽,纾大震,五更犯雨跪褥越王山,凡九夕,幸未见血,而卒不起,悲哉!)。”

②邱炜菱:《客云庐小说话·挥尘拾遗》,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第408页,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下引此书均此版)。

③可参看拙编《林纾著译系年》,见本人与薛绶之先生合编的《林纾研究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下引此书均此版)。

方作品中,除《民种学》、《布匿第二次战纪》、《拿破仑本纪》3种分别属于人种学、历史学、人物传记外,其余全系小说。而小说中又有一部分属于西方的名著,如1899年出版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法国小仲马原著,王寿昌口译)、1901年出版的《黑奴吁天录》(今译为《汤姆叔叔的小屋》,美国斯土活夫人原著,魏易口译)、1903年出版的《伊索寓言》(希腊伊索原著,严培南、严璩口译)、1904年出版的《英国诗人吟边燕语》(今译为《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英国查理·兰姆、玛丽·兰姆姐弟原著,魏易口译)、1905年出版的《迦茵小传》(英国哈葛德原著,魏易口译)、1905年出版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今译为《艾凡赫》,英国司各德原著,魏易口译)、1905年出版的《鲁滨孙漂流记》(英国笛福原著,曾宗巩口译)、1906年出版的《海外轩渠录》(今译为《格列佛游记》,英国斯威佛特原著,魏易或曾宗巩口译)、1906年出版的《红礁画桨录》(英国哈葛德原著,魏易口译)、1907年出版的《拊掌录》(今译为《见闻杂记》,美国华盛顿·欧文原著,魏易口译)、1907年出版的《滑稽外史》(今译为《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英国查理·狄更斯原著,魏易口译)、1907年出版的《孝女耐儿传》(今译为《老古玩店》,英国查理·狄更斯原著,魏易口译)、1908年出版的《块肉余生述》(今译为《大卫·考伯菲尔》,英国查理·狄更斯原著,魏易口译)、1908年出版的《歇洛克奇案开场》(今译为《血字的研究》,属《福尔摩斯探案集》中一部分,英国柯南道尔原著,魏易口译)、1908年出版的《贼史》(今译为《奥立佛·退斯特》或《雾都孤儿》,英国查理·狄更斯原著,魏易口译)、1908年出版的《不如归》(日本德富健次郎原著,魏易据盐谷荣的英译本口译)、1909年出版的《冰雪因缘》(今译为《董贝父子》,英国查理·狄更斯原著,魏易口译)等。钱锺书先生认为,林纾60岁以前的翻译“使我想象出一个精力饱满而又集中的林纾”,因为此时的译作“十之八九都很醒目”,“绝大多数有自序或旁人序,有跋,有《小引》,有《达旨》,有《例言》,有《译馀剩语》,有《短评数则》,有自己和旁人所题的诗、词,在译文里还时常附加按语和评语。这种种都对原作的意义或艺术作了阐明或赏析。”^①因此,从46岁开始到60岁之前,林纾中年时期的翻译无疑可称为他整个翻译事业的黄金时期,而中年林纾无疑也可以称为五四新文学的“不祧之祖”了。

那么,中年林纾的翻译事业究竟为五四新文学的兴起产生了哪样一些积极影响呢?

首先,林译小说曾以促进近代思想启蒙的方式间接地加惠于五四新文学。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响亮口号是“民主”与“科学”。而提倡“民主”与“科学”的直

^①钱锺书:《林纾的翻译》,钱锺书等著《林纾的翻译》(评论资料集)第34~35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出版(下引此书均此版)。

接目的是启蒙,是把人从封建主义、蒙昧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但是,20世纪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时代性的主题,却不仅仅是反封建,同时还要反对列强的侵略,谋求民族的解放。正因为这样,“反帝反封建”就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也是近代中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的两大大任务。一般的说,在反帝反封建这一点上,五四新文化运动要来得更坚决、更彻底一些,但近代国人在某个阶段、某个问题上的表现也相当激烈,而林译小说对此则产生过良好影响。1901年《黑奴吁天录》出版以后,就在读者中引起了巨大的思想震动。1903年,已经开始接触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后来又加入同盟会并领导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著名人物陈去病,就曾以“醒狮”为笔名发表过这样一首诗来抒发自己的感想:“专制心雄压万夫,自由平等理全无。依微黄种前途事,岂独伤心在黑奴?”^①当时在报刊上著文写诗抒发感慨,几成一时风气。一位署名“灵石”的读者说,他因为买不到此书便从友人处借到一本,“挟归灯下读之,涕泪洟澜,不可仰视,孱弱之躯不觉精神为之一振,且读且泣,且泣且读,穷三鼓不能成寐。”于是这位被林译小说“唤醒”了的“灵石”在文章的末尾声泪并下地写道:

我读《吁天录》,以哭黑人之泪哭我黄人,以黑人已往之境哭我黄人之现在。我欲黄人家家置一《吁天录》。我愿读《吁天录》者,人人发儿女之悲啼,洒英雄之热泪。我愿书场、茶肆演小说以谋生者,亦奉此《吁天录》,竭其平生之长,以摹绘其酸楚之情状、残酷之手段,以唤醒我国民。^②

1904年鲁迅在日本也收到友人寄来的《黑奴吁天录》,他在寄友人的信中说:“穷日读之,竟毕。……曼思故国,来日方长,载悲黑奴前车如是,弥益感喟。”^③《黑奴吁天录》之所以在读者中引起巨大的反响,显然是译者和作品的反帝思想在读者感情上引起了共鸣。林译小说在当时直接激发了读者的反帝意识的,自然并不只是《黑奴吁天录》。《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专门描写古代撒克逊遗民反抗诺曼人侵略的故事,鲁迅、周作人在当时就格外喜爱此书,其原因也在于其中寄寓了译者的反帝意识。

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等所谓“言情小说”,也曾明显地激发过当时青年一代的反封建意识。这类翻译小说热情地歌颂了那些青年男女

①醒狮:《题〈黑奴吁天录〉后》,《新民丛报》第31号,1903年5月20日。

②灵石:《读〈黑奴吁天录〉》,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第282页。

③鲁迅:《致蒋抑卮》,《鲁迅全集》第11卷第3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下引《鲁迅全集》均此版)。

们坚贞纯洁、执著如一的爱情，从而传播了近代西方追求爱情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新思潮，显然带有资产阶级启蒙文化的特征。茶女花渴求真正的爱情以及她与亚猛之间的爱情悲剧，不仅使青年读者们触目惊心看到在西方这个所谓的文明国度里照样存在着世俗的门第观念、沉重的封建压迫，而且使他们从马克与亚猛的悲剧中认识到必须为实现自主的、真挚的爱情起而斗争。署名“慧云”的读者在诗中写道：“病中咯血一声声，垂死频呼亚猛名。强起口口犹把笔，写将心事表坚贞。愿不从心伤命薄，几多苦恼有谁知。掷将性命惟拼诬，恨海清波岂尽期！”^①署名“冰谿”的读者在一首诗中这样说：“多谢文人笔似犀，流传震旦说巴黎。美人事事伤心语，怕见《漫郎》一卷题。”^②而严复的一首诗，更颇为谐谑地道出了《巴黎茶花女遗事》在客观上所起的反封建效果：“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③《迦茵小传》同样是描写青年男女反抗世俗观念和封建压迫、追求自由爱情的故事。小说的情节大体如下：女主人公迦茵是一位聪慧美丽的姑娘，但因系私生女，自幼依贫鄙的姨母长大。一日迦茵在颓垣古塔之下巧遇年轻的海军军官亨利，两人心地洁白，一见钟情。亨利是位男爵的儿子，男爵死后家中正濒临破产，欠下了富绅来文杰六万镑巨债。而来文杰之女爱玛却想嫁给亨利。于是亨利之母找到迦茵，请其退出与亨利的感情纠葛以促成亨利与爱玛的结合。这时迦茵已有身孕，她怀着绝望的心情嫁给了粗俗伦荒的土豪洛克，以绝亨利情愫。亨利误以为迦茵负心，一怒之下也与爱玛结婚了。狠毒的洛克嫉妒迦茵仍眷恋亨利，预谋枪杀亨利。迦茵闻讯奔至，代情人亨利饮弹。这时亨利才尽知前情，悔恨交加，而迦茵却含笑地安眠在亨利怀中。在林纾之前，《迦茵小传》已有蟠溪子（杨紫麟）和天笑生（包公毅）的合译本行世。但蟠溪子和天笑生故意删去了迦茵与亨利未婚先孕的情节。迨林纾的足本《迦茵小传》销行后，读书界曾引起一点风波。寅半生（钟骏文）著文指责林译本“传其淫也，传其贱也，传其无耻也，迦茵有知，又曷贵有此传哉！”^④寅半生是站在传统礼教的立场上挾伐林纾的，然而林纾的译本由于译文精彩，在青年中却有更大影响。郭沫若回忆说：“那女主人公迦茵是怎样引起了 I 深厚的同情，诱出了我大量的眼泪哟！”^⑤显然，《迦茵小传》在促进青年的个性解放意识上是产生了作用的。即使是林纾本人也意识到他翻译这类言情小说冲撞了森

①慧云：《读〈巴黎茶花女遗事〉》，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第584页。

②冰谿：《咏〈巴黎茶花女遗事〉二十首》，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第587页。诗中《漫郎》即亚猛赠马克的《漫郎摄实戈》，漫郎，巴黎名妓，身世与马克略近。

③严复：《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周振甫选注《严复诗文选》第20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

④寅半生：《读〈迦茵小传〉两译本后》，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第287页。

⑤郭沫若：《我的童年》，郭沫若著《少年时代》第1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